

## 西漢武、宣時期的言語侍從

徐興無\*

### 一、引言

武帝、宣帝兩朝是西漢政治與文化的盛世，也是文學的盛世，前賢多有闡論，無庸續貂。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文學創作的繁榮與詩賦作家群體的湧現，班固《兩都賦序》曰：

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飾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雅頌之亞也。<sup>1</sup>

班固所舉武、宣之世歌、賦作者有兩類，一為「言語侍從之臣」，一為「公卿大臣」，在班固稟持的儒家價值判斷中，「言語侍從之臣」的作品被視為漢代盛世的雅頌。不過班固對他們還有另一種評價，《漢書·藝文志》曰：

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辭麗以淫。」<sup>2</sup>

\* 徐興無現職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sup>1</sup> 〔南朝宋〕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頁1-3。

<sup>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藝文志〉，頁1756。

他認為，對詞藻買櫝還珠式的炫耀超越了詩賦的道德與政治職責。這兩種評價並非班固一人的創發，他在《司馬相如傳贊》中沒有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引述了司馬遷和揚雄對司馬相如的評價：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sup>3</sup>

司馬遷與司馬相如同時，其時經學受到武帝提倡，而司馬相如等金馬門文學侍從的創作也成就斐然，故在當代之人，直視其賦作為一代風雅。揚雄則生活在元、成之時，經學已臻極盛，章句、家法，壁壘森嚴，而武、宣兩朝金馬門文學盛時不再。世以通經為尚，獻賦之途日消。以經學標準衡量其事，故有揚子誨、貶之意。後世評價辭賦，大多折衷于漢人兩種觀點之間，如《文心雕龍·詮賦》所云：「風歸麗則，辭翦美（蕘）稗。」<sup>4</sup>

在以西方或現代文學史觀念為前提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中，也將「言語侍從之臣」稱為「文學侍從」、「文學之士」，以其所從事的「文學」為「宮廷文學」，二者構成為作家群體和文學活動。<sup>5</sup>不過，漢人眼中的「文學之士」、「言語侍從」以及「文學」活動決非如此狹隘，班固之論，亦唯就其中一項而言。考「文學」與「言語」之義，語出《論語·先進》中所謂「孔門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邢昺《論語注疏》釋「文學」為「文章博學」。<sup>6</sup>「文學之士」當指文章博學之士，即廣義上的儒士，如《韓非子·六反》曰：「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sup>7</sup>漢人亦作此解。《漢書·儒林傳》載：「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

<sup>3</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司馬相如傳〉，頁2609。

<sup>4</sup>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詮賦〉，頁136。

<sup>5</sup> 如當下大陸高校中文專業最流行的教科書，袁行霽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1卷描述「武帝朝文壇盛況」曰：「武帝少時即好文學，即位之後，對文學之士的親幸，對文學事業的熱心推動，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於是，一時文壇俊傑，集中在武帝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侍從群體。」袁行霽主編，聶石樵、李炳海分卷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卷，頁188。又如袁行霽先生《中國文學概論》第4章、第1節「宮廷文學」將「西漢武、宣二帝」時期作為中國文學史上宮廷文學的第一個中心。（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頁62-64。要之，這樣的觀念非袁氏獨創，而是現代學術領域內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通識。

<sup>6</sup> 邢昺：《論語注疏》卷11，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頁2498。

<sup>7</sup> 王先謙：《韓非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18，頁415。

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炅欽幼卿為文學。」<sup>8</sup>《王莽傳中》載莽曰：「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sup>9</sup>郭紹虞先生指出，漢人又分「文學」與「文章」。前者為學術，後來又指經術，可簡稱為「學」；後者為詩賦、子史著述，又可簡稱為「文」。<sup>10</sup>值得注意的是，漢人所謂「學」的內涵，更多的指向政治意義上的道術。漢家多徵文學之士，皆以從事政務，決非專門從事詩賦創作或顧問應對之事。《史記·孝武本紀》：「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sup>11</sup>《漢書·楚元王傳》載劉向上封事曰：「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sup>12</sup>《張湯傳》曰：「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sup>13</sup>而《霍光傳贊》稱霍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sup>14</sup>即以其無學術，不通治道。

「言語」之內涵則側重於「辭令」。古代諸侯、士大夫之間傳達資訊、論說、諫議都採用赴告、陳對之方式，《禮記·曲禮上》曰：「史載筆，士載言。」《正義》曰：「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sup>15</sup>戰國縱橫家更重遊說，《漢書·藝文志》載：「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為？』」<sup>16</sup>邢昺《論語注疏》亦釋「言語」為「言語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sup>17</sup>皆揭示了這一傳統，故漢人亦視一些游走于諸侯的文學之士為「遊說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載「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sup>18</sup>他們的晚輩們如嚴助（嚴忌之子）、枚皋（枚乘之子）又成了武帝時期的「言語侍從」，因此「言語」在漢代有辭令、遊說之義。故班固《漢書》列《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以其皆善於辭令、議論之人，《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歷數武帝朝的人才，亦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之語」。<sup>19</sup>他們創作的辭賦也帶有這些特徵，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曰：「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

<sup>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3604-3605。

<sup>9</sup> 同上註，頁 4125。

<sup>10</sup>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 26。

<sup>11</sup>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頁 451。

<sup>1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941。

<sup>13</sup> 同上註，頁 2639。

<sup>14</sup> 同上註，頁 2967。

<sup>15</sup> 孔穎達：《禮記正義》卷 3，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 1250。

<sup>16</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740。

<sup>17</sup> 邢昺：《論語注疏》卷 11，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 2498。

<sup>1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529。

<sup>19</sup> 同上註，頁 2634。

從田，龍陽之同釣也。」<sup>20</sup>劉師培《論文雜記》（八）亦以《七發》、《羽獵》等聘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sup>21</sup>

論至此，似明確「言語侍從之臣」或「文學之士」們決非單純的辭賦作家，應深入當時的歷史現場，全面審視這些「言語侍從之臣」的活動與創作，而不能僅僅局限在文學史研究或作者研究的論域來評價他們的成就，本文就此討論三個問題，一是漢代官制與武、宣時期「言語侍從之臣」的關係。二是金馬門待詔及其來源，三是言「言語侍從之臣」們的事業。<sup>22</sup>

## 二、內廷郎吏

如果從漢人的語境出發，則「言語侍從之臣」並非宮廷文人，而是與「公卿大臣」分屬不同的職官。「侍從」，即漢人所謂的內廷「從官」，屬於內廷郎吏系統，《漢書·百官公卿表》曰：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sup>23</sup>

嚴耕望先生《秦漢郎吏制度考》論郎官起源及流變曰：

古代封建時期，貴族之最低級曰「士」，以講習射禦為事，入衛國君，外從征伐；庶民不得參與也。至春秋戰國，封建制度逐漸崩潰，農民軍隊應時興起，士庶之分遂漸淆，「士」之稱亦轉屬

<sup>20</sup>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61。

<sup>21</sup> 劉師培撰，舒蕪校點：《中國中古文學史 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16。

<sup>22</sup> 我曾經在拙作《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章中涉及到這方面的考察，但陳論不專，剖析不全。後又在一些學校以此文題目做過講座，今特撰文詳論之。

<sup>23</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727。

讀書人。方是時，貴族壁壘雖馳，而君主集權轉甚，仍不得無親信之近衛，乃擇大臣子弟入奉宿衛、侍左右，出充車騎、從征伐；以其近居殿閣郎廡，故蒙「郎」稱。其性質、其地位與出身，蓋猶古代之「士」也。秦及西漢初葉，郎官宿衛宮闈，給事近署，職任親要一如往昔，而進身又大半由蔭任與賞選兩途，蔭任襲戰國之成規，賞選亦新興貴族（資產階級）之特權，則其性質與戰國之「郎」仍鮮殊異，是亦猶古代之「士」也，故或以「士」稱之。自武帝從董仲舒、公孫弘之議，創孝廉除郎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除郎之制，郎官性質漸變；迄乎東漢，賞選遂除，蔭任亦替，三署諸署郎多郡吏與經生，貴族豪富之子弟較少。亦唯如此，職轉冗閑，不以宿衛給事為要務，故東漢郎署專供行政人才之吸收訓練與回翔，不復為天子之禁衛家臣矣。<sup>24</sup>

日本學者大庭脩先生《秦漢法制史研究》認為：漢代「六百石以上的吏一般都是長吏，類似於後世的五品官以上，也可以說是由皇帝任命的敕任官，是高級官僚」。「百石與二百石之間有一條難以逾越的界限，百石吏由其機構的長官選任，他們通常不能進升到二百石，要進升到二百以上，必須等待著選舉或推薦。百石以下的是所謂『判任官』，二百石到四百石的是所謂的『奏任官』。」而「郎官的最低官秩是比三百石，在制度史上具有這個意義：由於被選舉成為郎官，就越過了二百石的界限，從而取得了奏任官的資格。」<sup>25</sup>嚴耕望先生亦云：「為中央地方行政長官所自出」。<sup>26</sup>故郎吏是漢代官僚的重要儲備。

進入內廷郎吏系統，廣義上就可稱為「從官」，《漢書·元帝紀》載初元5年詔曰：「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籍。」師古注引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sup>27</sup>即宮中任職的宦者皆是從官。但是嚴格說來，從官指天子的近侍，故師古糾正應劭之說曰：「應說非也。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科第郎、從官。」<sup>28</sup>師古所言「故此下云科第郎、從官」，指的是《元帝紀》永光元年2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

<sup>24</sup>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1年12月），上冊，頁89。

<sup>25</sup> 〔日〕大庭脩撰，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9。

<sup>26</sup>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上冊，頁90。

<sup>27</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86。

<sup>28</sup> 同上註，頁286。

從官。」師古注曰：「始令丞相、禦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sup>29</sup>朝廷既以四科察舉民間人才，又以四科考核內廷的郎吏、侍從。故師古侍從與郎吏非一事。《百官公卿表》曰：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sup>30</sup>

內廷稱「中」，或內廷之官又往往帶「中」字，如中大夫、中郎、侍中、給事中等。而大夫則是「郎之高選」，<sup>31</sup>故這類天子的侍從為加官，非專職。如以廣義的「侍從」論之，民間的文學之士被察舉徵召到京師，是否能擢為內廷郎吏，甚至成為天子的近侍，才是「從官」或「侍從」的判別標準。比如《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載嚴助「郡舉賢良，對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sup>32</sup>與朱買臣「俱侍中」；<sup>33</sup>後拜會稽太守，<sup>34</sup>則出為公卿大臣。此後又回返，「因留侍中」，<sup>35</sup>則又成為「侍從」。又如《公孫弘卜式寬傳》載公孫弘「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sup>36</sup>《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又曰：「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sup>37</sup>則公孫弘先以文學之士對策拜為博士，須加「給事中」方可進入宦者署金馬門，成為「言語侍從之臣」或「文學侍從」。後升遷丞相，就成了外廷「公卿大臣」。再如《董仲舒傳》稱仲舒以賢良對策，武帝「以仲舒為江都相」，<sup>38</sup>「中廢為中大夫」，<sup>39</sup>《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載武帝命待詔吾丘壽王「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sup>40</sup>則董仲舒先外任諸侯相國，再擔任高級郎吏。

如嚴耕望先生所言，武帝以前，蔭仕和貲選是郎吏的主要來源，這是與開國的軍功貴族和富人分享政治紅利，且武、宣兩朝許多傑人物也出身

<sup>29</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87。

<sup>30</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739。

<sup>31</sup>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57 年），頁 254。

<sup>3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775。

<sup>33</sup> 同上註，頁 2791。

<sup>34</sup> 同上註，頁 2789。

<sup>35</sup> 同上註，頁 2790。

<sup>36</sup> 同上註，頁 2617。

<sup>37</sup> 同上註，頁 2775。

<sup>38</sup> 同上註，頁 2523。

<sup>39</sup> 同上註，頁 2524。

<sup>40</sup> 同上註，頁 2794。

于蔭任與貲選，如袁盎、衛青、李陵、蘇武、霍去病、霍光、桑弘羊、張安世、劉向、韋玄成、張釋之、司馬相如、黃霸等等。<sup>41</sup>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統計，以孝廉、德行、明經、博士弟子等選舉為郎的，以後的仕途多為外遷，而蔭任為郎者往往內遷為近侍，加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給事中等官銜。但漢家也實行察舉或選舉制度，由中央察徵和地方舉薦賢良、文學或孝悌等人才入京對策、議事，賢者徵為郎吏，只是自賈誼到董仲舒等儒臣特別強調察舉，反對蔭仕和貲選，武帝采董仲舒、公孫弘等建議，獨尊儒術，立學官，並創孝廉除郎和博士弟子射策除郎，成為仕進正途，史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sup>42</sup>此後，郎吏漸漸地從光祿勳的屬下分化出來，散入國家機構，郎署成了國家行政人才的訓練基地，君主的侍中、常侍多由宦官擔任。故《漢書·佞幸傳》中，區分侍奉皇帝「公的方面的生活」的「士人」與「私的方面的生活」的「宦者」（屬於少府系統的宦官），<sup>43</sup>而《後漢書》則代之以《宦者列傳》，說明內廷從官已少有「士人」。如果說漢代有所謂的宮廷文學的話，也只能存在於西漢，而以武、宣時期為盛，觀《漢書》即可知司馬相如、東方朔皆在武帝朝、劉向在宣帝朝。元成以後，僅有揚雄、劉歆，而《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中所列傳主，元帝以後僅一賈捐之而已。

### 三、金馬門待詔

武帝 16 歲執政，努力擺脫母党和舅氏的控制；宣帝起於民間，努力擺脫權臣霍光家族的控制，所以他們不能依靠公卿大臣中的老臣或外廷官僚，而

<sup>41</sup> 楊聯陞先生《中國歷史上的人質》認為，「任子」與「質子」有關聯，從某種意上說，蔭仕的郎吏也是他們的父兄留在君主身邊的人質。參見楊聯陞撰，彭剛、程鋼譯：《中國制度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6-47。從整體上說，郎官是一個青年侍臣集團，其中又不乏十多歲就服官的少年郎吏，蔭仕者如劉更生，貲選者如桑弘羊（按：桑弘羊與劉更生很接近，《鹽鐵論·貧富》載其自稱：「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只是桑弘羊可能由貲選為郎，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前言》有考論），其他尚有終軍、張安世、杜緩、霍光、蘇武兄弟、上官桀、許廣漢、劉歆、王莽、班稚（班固祖父）等等。因此，對這些少年郎的成長、教育與選拔，漢宮之中有一定的制度。其實，幼年服官是秦漢時期宮廷、朝廷、地方郡縣乃至貴族府第皆有的現象。秦時甘羅 12 歲為上卿（《戰國策·秦策下》、《史記·甘茂傳》）；西漢時，王尊 13 歲為獄吏（《王尊傳》）；翟方進 12、3 歲給事太守府為小吏（《翟方進傳》）；董偃年 13 為館陶公主侍從（《東方朔傳》）。據王利器的研究，這些少年往往受到教育，至 18 歲時經過選拔委任從政。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會從 18 歲左右的青年中直接選拔官吏（《鹽鐵論校注前言》）。又王子今：《兩漢的少年史》一文論及少年郎官事，見《文史》2000 年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sup>4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傳〉，頁 3596。

<sup>43</sup> 郎中令（光祿勳）與少府的這種分工，見大庭脩先生：《秦漢法制史研究》，頁 30。

需要一個有朝氣的近侍集團。武、宣的事業，特別是武帝（宣帝主要靠新興的儒臣），基本上是這個集團幫助做成的，而「言語侍從之臣」正是其近侍集團。

班固《兩都賦序》提及武、宣二帝「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這些都是言語侍從之臣的活動場所。石渠閣為未央宮內的藏書閣，宣帝甘露3年詔諸儒於此平議《五經》異同。<sup>44</sup>所謂外興樂府，指漢武帝將屬於少府的音樂機構樂府設在上林苑中，采詩作樂。而金馬門為未央宮內的宦者署，《史記·滑稽列傳》載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sup>45</sup>《公孫弘卜式倪寬傳》師古注引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sup>46</sup>武帝的言語文學侍從多為金馬門待詔。顧炎武《歷代宅京記》以「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sup>47</sup>《漢書·東方朔傳》稱其「待詔金馬門」；<sup>48</sup>《司馬相如傳》載其賦奏為郎，後雖拜孝文園令，又因病免居茂陵，但其為郎時嘗從武帝獵長楊，過宜春宮，<sup>49</sup>故曾為近侍。《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稱武帝「尤親信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sup>50</sup>又稱武帝先得嚴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sup>51</sup>諸人皆在此時為武帝言語侍從之臣，故皆可視為金馬門待詔。宣帝修武帝故事，其言語近侍亦待詔金馬門，《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曰：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

<sup>44</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宣帝紀〉，頁272。

<sup>45</sup> 司馬遷撰：《史記》，頁3205。

<sup>46</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617。按，漢人言金馬門之淵源，莫詳於馬援，且後漢銅馬式，亦鑄於其手，見《後漢書·馬援傳》，而王先謙《漢書補注》不采其說。又，金馬門亦稱「金門」，一如稱太史公為「馬遷」。《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師古注引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敘傳》：「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

<sup>47</sup> 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4，頁62。

<sup>4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843。

<sup>49</sup> 同上註，頁2589、2591。

<sup>50</sup> 同上註，頁2775。

<sup>51</sup> 同上註，頁2775。



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佈》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sup>52</sup>

武宣兩朝金馬門待詔有蔭仕、貲選、察舉徵召等，如《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為景帝時貲選郎官，後從梁孝王遊，七國亂後蜀。因蜀人楊得意為武帝狗監，侍武帝讀《子虛賦》薦之，被徵為待詔郎官。《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載嚴助為郡舉賢良，至朝廷對策。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張子僑、華龍、柳褒、王褒俱徵為金馬門待詔。《楚元王傳》載劉向宣帝時12歲，蔭仕為輦郎。後以高材被徵，待詔金馬門。而武帝朝金馬門待詔中又多自薦者，即通過「公車上書」或「詣闕上書」自舉。這也是戰國之風，戰國縱橫家們多出身平民，因此要採取上書的方法遊說諸侯，求得召見，如《秦策一》載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sup>53</sup>《秦策三》載「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sup>54</sup>吏民上書受到鼓勵，《齊策一》載威王下令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sup>55</sup>可見至少在戰國時代，吏民上書、獻書現象已多。漢承其緒，亦鼓勵君臣吏民之間的文書交流，《武帝紀》載「詔賢良曰：『……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sup>56</sup>臣下可以自北闕上書言事，冀得召見或升遷。《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曰：

（朱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座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sup>57</sup>

……

（元光元年，主父偃）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sup>5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821-2822、2829。

<sup>53</sup>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1，頁85。

<sup>54</sup> 同上註，頁181。

<sup>55</sup> 同上註，卷8，頁326。

<sup>56</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60-161。

<sup>57</sup> 同上註，頁2791。

入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sup>58</sup>

……

（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sup>59</sup>

……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sup>60</sup>

又《東方朔傳》載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後來東方朔通過侏儒進見武帝，「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sup>61</sup>

按，西漢未央宮以北司馬門和東司馬門為正門，各立一闕。<sup>62</sup>士民「上書奏事謁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sup>63</sup>而東闕則為「朝諸侯之門也」。<sup>64</sup>漢廷諸宮皆設公車司馬，主受章疏。<sup>65</sup>士民上書者先在北闕公車等候天子接見，或不見如朱買臣、東方朔之類；或由公車徵入拜為郎吏大夫如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之類；或惹怒天子而受到懲罰。《漢書楚元王傳》載劉更生（劉向）上《封事》曰：「章交公車，人滿北軍。」<sup>66</sup>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sup>67</sup>故自舉者需承擔下獄的風險。武帝時上書自者

<sup>5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798、2802。

<sup>59</sup> 同上註，頁 2814。

<sup>60</sup> 同上註，頁 2830。

<sup>61</sup> 同上註，頁 2842-2843。

<sup>62</sup> 《史記·高祖本紀》：「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余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史記》，頁 385-386）馬先醒：《漢代之長安與洛陽》（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生博士論文，1972 年）考未央宮有四司馬門，東、西兩門外又立二闕，甚為精確。

<sup>63</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頁 64。

<sup>64</sup> 劉向語，見《漢書》，〈五行志上〉，頁 1331。

<sup>65</sup> 見《百官公卿表上》「衛尉」顏師古注：「《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漢書》，頁 729。

<sup>66</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941。

<sup>67</sup> 同上註，頁 1942。

多，不特承戰國餘風，亦緣武帝之胸次。《東方朔傳》曰：「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注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sup>68</sup>由此可知武帝並不追究「自銜鬻者」和「不足采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上書召見》專論武帝曰：

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為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臣尊嚴，宜與臣民闊絕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即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上書，俱召見……終軍上書言事，帝奇其文，即拜為謁者。甚而東方朔上書……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門遂以進用。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sup>69</sup>宜乎興文治，建武功，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為太子訟冤，帝大感悟，召見，即拜為大鴻臚。不數月，遂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時禁網疏闊，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sup>70</sup>

上舉武宣兩朝金馬門待詔數人，蔭仕1人、貲選1人、察舉徵召6人、自薦7人，而蔭仕者和貲選者後又被徵召拔擢，仍可歸入察舉徵召，故金馬門待詔等言語侍從之臣悉為察舉徵召和自舉者。此一則可見武帝朝察舉制已鞏固了下來，一則可見文學侍從須以才華和學術進取，軍功貴族子弟蔭仕與貲選者多不勝任，故不得不向吏民開放。

#### 四、言語侍從之臣的事業

金馬門中的言語侍從們展開了豐富而全面的政治、思想學術和文學創作活動，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言語辨說，使適四方。此為言語侍從之臣之本職。據《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武帝的言語侍從們經常就政事作出對策，並代表天子與外廷大臣進行辯論。比如「上令（嚴）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sup>71</sup>建元3年（西元前137），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于漢，丞相田蚡認為越人相攻為常事，不足煩漢廷相助。嚴助詰田蚡無為不振。<sup>72</sup>武帝欲築朔方城，公孫弘諫，以為疲敝中國。「上使（朱）

<sup>6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841-2842。

<sup>69</sup> 同上註，〈東方朔傳〉，頁2862。

<sup>70</sup>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5。

<sup>71</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775。

<sup>72</sup> 同上註，頁2776。

買臣難誦弘。」<sup>73</sup>再如公孫弘奏言令民不得挾弓弩，武帝以吾丘壽王上疏難公孫弘，使其誦服。<sup>74</sup>又如宣帝善《谷梁傳》，以劉向待詔，選郎十名從江公、周慶等學，積十多年後，與《五經》名儒、博士辯論於朝廷。<sup>75</sup>

武帝還委派他們越過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體系，出朝專門辦理邊郡的政務。如命嚴助持節發會稽兵出救東甌；<sup>76</sup>朱買臣出為會稽太守；<sup>77</sup>吾丘壽王出為東郡都尉；<sup>78</sup>終軍出使南越；<sup>79</sup>即專以辭賦得幸的司馬相如，也曾為武帝出使過巴、蜀。<sup>80</sup>宣帝朝的劉向、王褒、張子僑等的職責也是「屬文辭」、「進對」。宣帝朝不及武帝朝多事，但也依循故事，承其餘緒。如遣益州人王褒往益州祭金馬碧雞之神。<sup>81</sup>

其二、講論經學，商量百家。武帝朝的言語侍從之臣已能追摹武帝時的風氣，以經術，特別是《春秋》文飾吏事。如東方朔自云十六學《詩》、《書》。<sup>82</sup>主父偃初學縱橫，晚學《易》、《春秋》、百家言。<sup>83</sup>武帝甚至要求他們根據經術議論政事。如嚴助出為會稽守，武帝賜書命對會稽事，要求他「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sup>84</sup>又詔使吾丘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sup>85</sup>宣帝與言語侍從之臣的經學活動就更為深入，甚至在自己的郎官侍從系統中培養出一個與太常博士系統抗衡的經學學派，《漢書·儒林傳》載：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谷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

<sup>73</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791-2792。

<sup>74</sup> 同上註，頁 2795。

<sup>75</sup> 同上註，〈儒林傳〉，頁 3618。

<sup>76</sup> 同上註，頁 2776。

<sup>77</sup> 同上註，頁 2792。

<sup>78</sup> 同上註，頁 2795。

<sup>79</sup> 同上註，頁 2821。

<sup>80</sup> 同上註，〈司馬相如傳〉，頁 2577、頁 2581。

<sup>81</sup> 同上註，頁 2830。

<sup>82</sup> 同上註，〈東方朔傳〉，頁 2841。

<sup>83</sup> 同上註，〈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頁 2798。

<sup>84</sup> 同上註，頁 2789。

<sup>85</sup> 同上註，頁 2794。

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谷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谷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谷梁》。由是《谷梁》之學大盛。<sup>86</sup>

可見，宣帝增立博的辦法是先民間徵召經師，拜為郎吏，使之在郎官系統中傳授研習，再與博士辯論而立於學官。又據《儒林傳》，宣帝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顏師古曰：「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其子梁丘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sup>87</sup>又韓嬰傳韓《詩》，「亦以《易》授人……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sup>88</sup>又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張禹與蕭望之同時為禦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于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議郎），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sup>89</sup>由於宣帝的提倡，相對於博士學官，郎吏系統內也沿續著經學授受，保存了一些民間之學。郎吏出身的劉向、劉歆父子、揚雄等人皆能擇善而從，轉益多師，兼收並蓄，保持了通儒之學的風貌。甚至父子相難，完全沒有博士經學嚴守家法、師法的保守學風。如《楚元王傳》載劉向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谷梁》義。」<sup>90</sup>

武帝朝的言語侍從之臣們大都有縱橫習氣，而其學又雜出百家。如主父偃學學長短從橫術、百家之言；嚴安上書引《鄒子》；<sup>91</sup>東方朔自稱十九學孫吳兵法。《漢書·藝文志》列嚴助、終軍、吾丘壽王、劉向等於儒家；<sup>92</sup>

<sup>86</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3618。

<sup>87</sup> 同上註，頁 3600-3601。

<sup>88</sup> 同上註，頁 3613-3614。

<sup>89</sup> 同上註，頁 3620。

<sup>90</sup> 同上註，頁 1967。

<sup>91</sup> 同上註，〈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頁 2809。

<sup>92</sup> 同上註，頁 1727。

武帝時郎中嬰齊于道家；<sup>93</sup>主父偃、徐樂、嚴安、膠蒼為縱橫家；<sup>94</sup>東方朔為雜家；<sup>95</sup>武帝時待詔饒、安成、虞初為小說家。<sup>96</sup>宣帝講論六藝群書，群書即指六藝之外的百家。宣帝好法家，劉向《別錄》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侍郎張子喬正其字。」又曰：「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sup>97</sup>劉向著有《說老子》一書。《藝文志》既列劉向於儒家，又列其《說老子》於道家。<sup>98</sup>

此外，皇家圖書的典藏與整理也由郎吏負責。《張湯傳》載張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sup>99</sup>皇家圖書稱中秘書，又稱中書、秘府，武帝建立了書籍典藏制度，而光祿大夫劉向等於成帝河平三年主持的校書活動達二十多年，於中國典籍文化影響至深。《漢書·藝文志》稱：「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得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sup>100</sup>

其三、造作詩賦，制禮作樂。歌詩的造作與武、宣二朝的制禮作樂有關。班固言「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指武帝為將甘泉太一之祀定為郊祀之典，不用太常所屬太乐，而另立樂府。《禮樂志》曰：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後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

<sup>93</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731。

<sup>94</sup> 同上註，頁 1739。

<sup>95</sup> 同上註，頁 1741。

<sup>96</sup> 同上註，頁 1744-1755。

<sup>97</sup> 姚振宗輯錄，鄧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澳門：澳門大學，2007年），頁 51。又，張子喬即《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中提及的張子喬。見楊樹達：《漢書管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 497。

<sup>98</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729。

<sup>99</sup> 同上註，頁 2647。

<sup>100</sup> 同上註，頁 1701。

呂，以合律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sup>101</sup>

漢承秦制，音樂機構一直有二，一為太樂，屬太常，掌宗廟音樂。一為樂府，屬少府，為服務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宮廷音樂機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卷8）引呂氏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也。」<sup>102</sup>故武帝欲興作新的祭祀音樂，不假太常的音樂機構，而是加強了少府的音樂機構，起用屬於郎吏、少府近侍系統中的言語侍從之臣助成制禮作樂的事業。班固之所以稱這個樂府是「外興」的，是因為武帝把樂府設在長安城外的上林苑，如《禮樂志》所云：「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sup>103</sup>宣帝的制禮作樂活動始于神爵元年。《漢書·郊祀志》：

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與。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sup>104</sup>

霍氏敗後，宣帝便立即恢復了武帝的甘泉太一之祀和樂府活動，並在他執政的期間頻繁地親自致祭。宣帝似更加傾向造作雅樂，「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益州刺史王褒也迎合上意，命「王褒作《中和》、《樂職》、《宣佈》詩，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歌之」。據《王褒傳》云「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可見當時亦以童聲歌唱。他們後來在太學歌唱，受到宣帝的接見與褒獎。在宣帝提倡的雅樂風尚的影響下，言語侍從之臣對雅樂有所喜好。如劉向作有《雅琴賦》，現只殘存12句：<sup>105</sup>或與王褒作於金馬門時期的《洞簫賦》構成了金馬門時期詠頌雅樂的雙璧。王褒的《洞簫賦》多體現儒家雅樂之精神，如「並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順敘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

<sup>101</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045。按，武帝開上林苑事，見載於《東方朔傳》，《漢書》，頁2847。又《三輔黃圖》卷四《苑囿》載：「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四部叢刊三編景元本。

<sup>102</sup>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03</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071。

<sup>104</sup>同上註，頁1248-1249。

<sup>105</sup>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53。

餘音兮。」<sup>106</sup>《藝文志》錄「雅琴趙氏七篇」，<sup>107</sup>劉向《別錄》曰：「趙氏者勃海人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sup>108</sup>又錄「雅琴龍氏九十九篇」，<sup>109</sup>《別錄》曰：「雅琴龍氏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見待詔，後拜為侍郎。」<sup>110</sup>又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sup>111</sup>「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姚振宗曰：一作閉邪），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sup>112</sup>劉向的《琴頌》就是《雅琴賦》，一如王褒的《洞簫賦》又稱《洞簫頌》。劉向晚年校書，輯纂《說苑·修文》，於其中稱讚雅琴曰：「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sup>113</sup>《禮樂志》又載劉向建議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重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sup>114</sup>由此可見宣帝朝雅樂的興盛與影響。

武、宣二朝言語侍從之臣多以獻賦得進，囊括了漢代第一流的辭賦作家，其賦作皆有歌功頌德的色彩，故《史記·司馬相如傳》又稱司馬相如的《大人賦》為《大人之頌》；<sup>115</sup>《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稱王褒《甘泉賦》、《洞簫賦》為「《甘泉》及《洞簫》頌」。<sup>116</sup>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sup>117</sup>《楚元王傳》載劉向「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sup>118</sup>辭賦又有療疾之效，梁孝王的言語侍從枚乘《七發》即借吳客為楚太子療疾而作。五鳳年間，宣帝的太子（即元帝）因愛妾司馬良娣病死，精神恍惚，

<sup>106</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44。

<sup>107</sup>同上註，頁1711。

<sup>108</sup>姚振宗輯錄，鄧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頁27。

<sup>109</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711。

<sup>110</sup>姚振宗輯錄，鄧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頁27。

<sup>111</sup>同上註。按，龍德，《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作龔德。楊樹達《漢書管窺》曰：「姚振宗云：當從《別錄》、《藝文志》作龍德。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龍德乃治地龍子之後。樹達按：龍子見《孟子》。」頁214。

<sup>112</sup>同上註。

<sup>113</sup>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06。

<sup>114</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033。

<sup>115</sup>司馬遷撰：《史記》，頁3063。

<sup>116</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2829。

<sup>117</sup>同上註，頁2829。

<sup>118</sup>同上註，頁1928。



抑鬱不樂。<sup>119</sup>宣帝遂命王褒等人皆赴太子宮娛待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sup>120</sup>

兩朝言語侍從之賦見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者有：「屈原賦之屬」著錄司馬相如賦 28 篇、吾丘壽王賦 15 篇、光祿大夫張子喬賦 3 篇（班固自注：「與王褒同時也。」），劉向賦 33 篇，王褒賦 16 賦篇；<sup>121</sup>「陸賈賦屬」著錄常侍莊蔥奇賦 11 篇（班固自注：枚皋同時）、瑞助賦 35 篇、朱買臣賦 3 篇、郎中嬰齊賦 10 篇、車郎張豐賦 3 篇（自注：「張子喬字。」蓋張子喬拔擢于車郎）；<sup>122</sup>「荀卿賦之屬」著錄侍郎謝多賦 10 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 2 篇。<sup>123</sup>

金馬門待詔們歌功頌德的辭賦創作受到了當時大臣們的非難，為此，宣帝辯解道：「不有博奕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sup>124</sup>王褒《四子講德論》也宣稱：「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sup>125</sup>劉向亦有《世頌》之作。

漢賦出於楚辭，武帝好楚辭，曾使淮南王為《離騷傳》，故武帝時朱買臣以言《楚辭》見召。宣帝亦好辭賦，徵九江被公誦讀《楚辭》。所以他們的言語侍從之臣又多摹擬之作。如嚴忌作《哀時命》、東方朔作《七諫》，王褒作《九懷》。劉向對楚辭情有獨鐘，晚年校書時，選擇屈原、宋玉等人的辭賦，系以賈誼、淮南小山、嚴忌、王褒、東方朔、等摹擬、傷吊屈、宋之作，附其《九歎》，編成《楚辭》，此固與金馬門言語侍從們對楚辭的誦讀和習作有關。

傳統詩學認為，七言詩起自《柏梁台詩》。《世說新語·排調》載謝安問王子猷「何為七言詩？」劉孝標注曰：「《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sup>126</sup>全詩見於《藝文類聚》、《古文苑》等文獻，而《漢書·東方朔傳》不載此事。顧炎武《日知錄》卷 21「柏梁台詩」條曰：「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sup>127</sup>游國

<sup>119</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元後傳〉，頁 4015。

<sup>120</sup>同上註，〈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頁 2829。

<sup>121</sup>同上註，頁 1747-1748。

<sup>122</sup>同上註，頁 1749。

<sup>123</sup>同上註，頁 1751-1752。

<sup>124</sup>同上註，〈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頁 2829。

<sup>125</sup>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 51，頁 2250。

<sup>126</sup>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35。

<sup>127</sup>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 年），頁 746-747。

恩先生認為出自魏晉人的偽作。<sup>128</sup>而逯欽立先生與余冠英先生則不排除此詩作于武帝時的可能。<sup>129</sup>但無論如何，七言（包括八言、六言）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則出現於西漢，它有別於來自《詩》、《騷》傳統的歌詩，而是韻語，故漢人以「言」稱之而不列入歌詩。余冠英先生認為它直接襲自如《荀子》中的《成相辭》一類的委巷俚俗謠諺體裁，漢代的字書如《凡將》、《急就》；以及樂府、鏡銘、讖緯中皆有七言。直至西晉人，仍認為七言是一種體小而俗的體裁。<sup>130</sup>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柏梁台詩》是真是假，但史書所載的文人創作始於東方朔，劉向亦有七言殘句 6 句留存。<sup>131</sup>《東方朔傳》載東方朔對武帝射覆即為七言，其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晰蜴。」<sup>132</sup>《傳》中稱「朔之文辭」，「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獵賦》、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曰：「劉向《別錄》所載。」又《東方朔傳贊》載：「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sup>133</sup>可見劉向比較仰慕東方朔，他對東方朔七言的效仿，或亦始於金馬門待詔時期。

其四、博盡奇異，探究方術。年富力強的君主和他的近侍們精力十分旺盛，對知識與遊樂以及神秘世界有著濃厚的興趣。武帝好神仙方術，蓄侏儒俳優，喜田獵、巡狩自不待言，宣帝從小亦長於閭裏，遊歡遊俠、鬥雞、走馬。宣帝為辭賦辯護，可見他對倡優博奕的興趣。劉向的《圍棋賦》或是此時的作品。又《西京雜記》卷 2 載劉歆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sup>134</sup>

<sup>128</sup> 見游國恩：〈柏梁台詩考證〉，收於《游國恩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52-379。

<sup>129</sup> 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頁 97，「柏梁詩」案語。余冠英：〈七言詩起源新論〉，收於《古代文學雜論》（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30。

<sup>130</sup> 徐陵編：《玉台新詠》卷 9 載傅玄《擬四愁詩·序》曰：「昔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

<sup>131</sup> 散見於《文選》李善注，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2，頁 115。

<sup>13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843。

<sup>133</sup> 同上註，頁 2873。

<sup>134</sup> 葛洪：《西京雜記》卷 2，四部叢刊景印明喜靖本。

小說也是武、宣兩朝君主與文學侍臣共同喜好的事，田獵之時亦攜帶小說，所謂「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匪唯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是俟是儲。」<sup>135</sup>《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所收漢人小說家著作 6 種，分別為《封禪方說》18 篇（自注：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25 篇（師古注引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也）、《待詔臣安成未央術》1 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臣壽周紀》7 篇（自注：項國圉人，宣帝時）、《虞初周說》943 篇（自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139 卷<sup>136</sup>（劉向《說苑敘錄》：「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膠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sup>137</sup>上述小說 6 種，4 種出自武、宣兩朝文學待詔之手（《百家》為劉向晚年編纂的文獻）。

武、宣兩帝皆好神仙。《史記·封禪書》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sup>138</sup>而言語侍從之臣多有勸進。《司馬相如傳》載相如見上好仙，「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陵雲氣遊天地之間意」。又遺笏書言封禪事。<sup>139</sup>《東方朔傳》載其有《封泰山》。《嚴朱吾丘主父徐巖終王賈傳》載上幸雍，獲白麟，又得奇木，武帝異此二物，博謀群臣。終軍遂上對勸封禪之事。<sup>140</sup>《郊祀志》載宣帝聽從方士之言，多所立祀。其中神仙之祀有「仙人」、「玉女」、「五龍山仙人」、「黃帝」等。<sup>141</sup>又載：

其三月，幸河東，祠後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sup>142</sup>

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

<sup>135</sup>張衡〈西京賦〉，收於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 2，頁 68。

<sup>136</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1744-1745。

<sup>137</sup>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頁 1。

<sup>138</sup>司馬遷撰：《史記》，頁 1384。

<sup>139</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600。

<sup>140</sup>同上註，頁 2814。

<sup>141</sup>同上註，頁 1249-1250。

<sup>142</sup>同上註，頁 1249。

方士之虛語，遊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sup>143</sup>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載：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sup>144</sup>

王褒死於回鄉的途中，留下了一篇《碧雞頌》。<sup>145</sup>劉向則因鑄黃金不成而下獄。《楚元王傳》載：

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sup>146</sup>。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系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減死論。<sup>147</sup>

劉向博學，多知方術奇異之事，劉歆《山海經書錄》曰：「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sup>148</sup>劉向後于成帝朝典校秘書，雖數術方技之書啼不由他校理，但目錄當由他撰寫。現在殘存的《別錄》中，還有著錄數術雜占《五

<sup>143</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250。

<sup>144</sup>同上註，頁2830。

<sup>145</sup>殘句見於《水經注》、《文選》李善注、《後漢書·西南夷傳注》中。嚴可均輯入《全漢文》卷43。按：王褒赴益州祭金馬、碧雞之神事又見《郊祀志》，注引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漢書》，頁1250。

<sup>146</sup>劉向所獻淮南《枕中鴻寶苑秘》之書，是武帝時其父治淮南獄時所得一事，考史者早有疑問。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8曰：「淮南王安以謀反誅，事在元狩二年。此傳言昭帝即位，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自元狩元年，數至後元二年昭帝即位，實三十六年矣。當淮南獄起時，恐德尚未生，安得預治獄之列？」（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校點：《二十二史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45。）王先謙《漢書補注》以為：「德傳言治劉澤詔獄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光緒刊本，1995年〕，頁939）按，劉德治劉澤詔獄在始元元年（B.C. 86），而元鳳元年（B.C. 80）劉德又雜案上官氏、蓋主與燕王謀反之事。《武五子傳》稱燕王旦「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遊士」。（《漢書》，頁2751）其收藏方術典籍或頗豐，而詔書送至燕王國中令其自裁，又當由劉德主持的宗正府辦理。因此，元鳳元年劉德在辦理燕王旦一案中獲得淮南洪寶、苑秘之方的可能性最大。

<sup>147</sup>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1928-1929。

<sup>148</sup>姚振宗輯錄，鄧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頁66。

法積貯寶藏》和《扁鵲內經》、《外經》的文字。大約東漢明帝與順帝之間出現的中國第一部神仙傳記《列仙傳》也將作者姓名依託為劉向。<sup>149</sup>

## 五、餘論

蓋文、景不好文學，賓客方術遊說之士依於諸侯，一仍戰國縱橫格局，而至武帝朝，諸侯勢衰，且多被羅織，一王敗，則連引數千人，士人當亦牽連，而此時鄒陽、枚乘、嚴忌之徒亦已凋零。司馬相如以貲選為景帝武騎常侍，以景帝不好文學，客游梁，與諸侯游士居，梁王薨，亦歸蜀。惟賴武帝興禮作樂，變革選舉，用人多途，利用內廷郎吏體系，組建以金馬門待詔為核心的文學近侍集團，以突破漢家所承秦制的格局，故民間文學之士得以複起而幅湊於中朝。而宣帝亦修武帝故事，廣徵言語侍從之臣，號稱中興，兩朝政事、文學遂成一代之盛，其成就決非詩賦一項可以論衡。而其衰也，亦緣元成以降，人主荒於主政，或委政中官，或托諸外戚，言語侍從之臣遂無翱翔之地。史臣亦以漢之得人之盛，歸諸武、宣兩朝，盛讚其事，摘錄其文以為結束：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於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世。<sup>150</sup>

<sup>149</sup>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19，頁1207。

<sup>150</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頁2634。

